

在多边合作中推进中日关系发展^①

叶自成

内容提要：中日关系是东亚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两国都是具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潜力的国家，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中日合作对东亚的稳定与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中日双边关系近来受到历史问题、美日安保条约扩大和钓鱼岛争端的困惑，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多边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中日两国可以通过推动东北亚、东南亚和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体系的建立进程来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为此，两国必须承认彼此在东亚合作体系中共同的主导作用而不是相互排斥。

关键词：中日关系 多边合作 双边关系

作者简介：叶自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交学系主任。（邮政编码：100871）

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声明》，中国与日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日两国的关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30年来，在两国人民和政府的努力下，两国关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90年代中期以来，两国关系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在回顾30年来中日关系走过的曲折道路时，应该寻找新思维。这个新思维的基本思想就是：在东亚的多边合作中，将中日关系推向新的水平。

一、中日关系是东亚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一山必须容两虎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大国，两国的关系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亚洲和世界的稳定。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亚洲领土最多的国家，近20年来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也是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中国也是亚洲仅有的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① 该部分摘自叶自成教授的新著《大国之道：中国如何成长为世界大国》（即将由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值此中日建交30周年之际，经作者允许在本刊先行刊出。

日本是中国周边国家之一，有人口 1 亿多，领土 38 万平方公里。日本在 19 世纪是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亚洲国家。日本也是二战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它在 60—80 年代创造了所谓的日本奇迹，其国民生产总值在 20 年中超过了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90 年代以来，虽然日本国内发生了很大的政治变化，经济也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的阶段，但日本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有望成为世界多极中一极的大国。

日本的 GDP 1990 年到 2000 年连续 10 年为低增长或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33%；2001 年为负 0.5%，而 2002 年预测只有 0.2%；企业破产率增高，失业问题开始突出，失业率从 1990 年的 2.1% 上升到 2001 年的 5.0%，预测 2002 年为 5.6%，失业人数达 320 万。日本银行的坏帐高达 153 万亿日元，占日本 GDP 的 36%，股市从 1991 年日经平均股价 38916 日元降至 2001 年的 9610 日元，2001 年日本政府的债务高达 666 万亿日元，占 GDP 的 130%，日元汇率从 1995 年的最高 1 美元兑 80 日元降到 2001 年 12 月的 1 美元兑 128 日元。综合竞争力曾是日本的强项。例如据瑞士 IED 统计，1989~1992 年日本的综合竞争力在近 50 个主要国家中连续 4 年排行榜首，然而 1993 年日本在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下降到第 2 位，到 2001 年竟然下降至第 26 位。一向被认为擅长于应用技术的日本，在信息技术应用程度方面却仅仅居世界第 21 位（据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开发中心于 2000~2001 年对世界上 75 个国家或地区的调查），日本的个人电脑、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也在世界第十几名或二十名前后。

在政治方面，过去以自民党为中心、以社会党等在野党为牵制和制约的政党体系已经被保守和偏右翼的政党政治取代，这些保守政党的政治家，都主张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都对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采取一种拒不承认并反而以在这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来迎合一部分选民的心态，都倾向于支持日本向海外派兵以扩大日本的国际影响。在如何改革日本的体制方面，90 年代以来的历届日本政府都没有太大的作为，他们采取的措施往往治标不治本，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原来很糟糕的局势更加恶化，使经济衰退加深，政治混乱，失业人数上升，治安恶化，犯罪率上升。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甚至在 2001 年 4 月 7 日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文章中指出，“日本正处于战后最严重的国家危机中，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泡沫均已破灭，政治泡沫的破灭表现为接连出现短命内阁，经济泡沫的破灭表现为政府为大型企业护航的缺陷，社会泡沫的破灭则体现为犯罪案件激增和教育状况恶化”，而造成这些危机的总根源在于日本的体制。当年曾创造出日本奇迹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冷战后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潮流。

但在这样一种局势下，日本也没有放弃恢复其世界大国地位的心态，而且日本也具有这方面的实力。日本 2000 年的 GDP 为 47510 亿美元，仍然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其军事实力按军费计算为 465 亿美元，也仍是第二大国；日本是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最大的贸易顺差国，2000 年贸易总额为 8618 亿美元，其中出口 4807 亿，进口 3811 亿美元，收支盈余约为 1166 亿美元；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01 年日本的外汇储备从年初的 3600 亿美元增加到 11 月底的 4040 亿美元，比美、加、英、法、意这 5 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加起来还要多出大约 30%；日本 2000 年末的海外净资产达到 11579 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日本的官方外援总数达 130 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在 2000 年，日本以汇率换算的人均 GDP 高达 37528 美元，仅次于卢森堡居世界第二；日本的制造业技术水平堪称世界第一。日本的钢铁业在产量方面仅次于中国（1 亿 1434 万吨）、美国（9866 万吨），居世界

第三位(1999年数字),但在高级钢材的产量方面超过中国居世界第一,在钢材出口方面居世界第一位(1998年日本出口粗钢2762万吨)。日本的汽车产量(包括轿车、卡车和公共汽车)为1005万台,仅次于美国(1200万台)占世界第二位。日本机床工业的年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日本生产的机床的“数控化”程度超过了美国。日本的工业机器人的年产量和使用量均占世界第一。日本和韩国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造船大国,相互展开了激烈竞争,其后则有西欧各国和中国的追赶。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国民人均拥有对外纯资产额约100万日元,相当于8000美元;日本国民拥有高达1490万亿的个人金融资产,仍是世界上最有钱(但是人们普遍不肯花钱)的国家。尽管综合竞争力排名大大后退,但日本的科技竞争力仍然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日本对科技研究开发投入的经费之多(按IMF汇率计算的研究开发经费总额,1999年数字),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2位,多于欧洲3个主要国家德、英、法的总和。日本的研究工作者人数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2位。又据2001年7月发表的《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1998至1999年日本的高新技术出口产值也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日本是国民平均文化素质最高的国家,这也是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贵重资源。日本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77.10年和83.99年(1999年数字)。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经济规模和实力仍然大大超过除美国外的其他发达国家,例如日本的GDP相当于中国的4.4倍,人均GDP相当于中国的44.4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虽大大超过日本,但中日经济对比关系只能说是“上升中的发展中国家与停滞中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日本在许多高科技方面仍然居世界领先水平。^①

日本和中国一样,是一个正在争取成为世界大国的国家。日本的战略目标不仅是要保持其经济大国的地位,而且也争做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再进一步成为与其总体实力相当的世界大国。日本现在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它的未来取决于日本改革的结果和道路的选择。和中国一样,日本也还有机会再次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如果它能痛定思痛,总结历史教训,能正确处理战争问题和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话,日本有更有利的条件比中国更快成为世界大国。正如有些学者分析的,即使日本保持零增长,而中国保持7%的发展速度,中国也要20年时间才能大体上达到日本现在的GDP47500亿美元的水平。因此,日本既是中国的邻居,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竞争对手之一。日本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总量居第一位。

但是日本成为世界大国还缺乏四样东西:1.日本不少右翼政治家有称霸东亚的政治野心,但日本对自己做的事情没有勇气面对,只能用一些小家子气的动作来掩盖,没有成为世界大国的政治勇气;2.日本政治家成百上千,但缺乏有政治魄力和远见的政治领袖;3.日本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但缺乏成为世界大国所必需的文明创造力;4.日本的商品、资金可以全世界满天飞,但日本在东亚缺乏亲和力。

中日这两个相邻的大国,和则两利,亚洲和世界也得利,不和则两伤,对亚洲和世界也不利。因此,处理好中日关系也是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有些人习惯从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的地缘政治思维和零和思维来认识中日关系,认为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中日不可能相容,其关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实际上,中日关系是相互合

^① 王洛林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和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282—289页。

作和互补的关系，如果要使东亚整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地区，中日两国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取代谁。中日两强合则东亚兴，分则对东亚的稳定与和平不利。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而中日合作才能实现东亚联合，正是在东亚的联合中，中日两国关系才能找到新的合作基础。中国的人口占东亚的60%，没有中国的东亚大不起来，而日本的经济总产值占东亚的66%，因此没有日本的东亚很难繁荣起来。“未来的东亚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①

二、三大难题与中日双边关系发展的困境

中日自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在经济层面上发展较快。1972年以来，两国人员往来从每年9000人次，增加到1997年的约130万人次，双边贸易由11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538亿美元，1998年为579亿，1999年661亿，2000年达到831亿，2001年达到900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国；1997年日本在华投资达18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港澳台地区的第二大投资伙伴。^②日本是对中国提供政府优惠贷款最多的国家，1997年累计达22600亿日元，合380亿美元，超过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③

但另一方面，中日关系自1992年以来，由于受到诸多问题的困扰而停步不前。这些问题主要是：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端；两国围绕美日安保条约及有关台湾问题的争论；两国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认识问题。两国在这些问题上持有完全矛盾的立场。

中国认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则认为是日本的领土。

中国认为，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的产物，而包括所谓“周边事态法”在内的美日安保体制实际上针对中国；而日本解释说条约主要针对地区的不稳定，是稳定东亚地区局势的保障，主要不针对中国，而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又有一些高级官员多次认为该条约将适用“周边事态”，当然包括台湾在内；还有些日本人则闪烁其词，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在“周边事态”问题上为难日本，因为根据条约日本是否干涉台湾海峡的事务，主要取决于中国是否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其次取决于美国是否派军队介入，最后才涉及到日本是否派军队援助美国，因此这一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并不重要。^④

中国认为，中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问题上已经很宽容，中国对日本的战犯宽大处理，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中国领导人对日本侵华战争表示了向前看的态度等，而日本在这样的条件下对过去的侵华战争还不肯作出全面而深刻的反省，却通过多种形式企图为本国侵华战争翻案，甚至根本否认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实在是不能容忍。

日本虽然有不少人主张对战争责任进行深刻反省，但有五种论点使许多日本人不能正视这一历史。1. 形势变化论。中国应该理解日本不认罪的现实很大程度上是由战后半个世纪国际形势的变化所致。2.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论。日本是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3. 国

① 张毅君：“东亚联合不是中日争夺”，《环球时报》2002年4月4日。

② 日本驻华大使谷野：《日中关系的回顾和展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1999年5月。

③ 见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北京代表处1999年10月编制的材料。

④ 田畑永光：《日本与中国21世纪所面临的课题》，载高宽海编：《跨世纪的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62—264页。

民情感和自尊心论。认为即使日本在战争中犯下了罪行，也不能公开道歉和承认罪行，因为日本是试图只记得光荣历史的国家，日本人不能因过去的侵略战争而谴责在战争中死去的父辈们的行为；不能谴责死者是日本社会的特点；承认战争罪行不利于培养健全的日本人，无助于培养年青人对日本的“自豪感”。4. 过去无所谓论。日本已经用行为改正过去的错误，日本宪法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人，因此亚洲各国应当相信日本人民，不要再难为日本。5. 对华战争是东亚的“解放战争”论，完全否定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要求从教科书中完全删除有关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自虐的历史认识”。^① 这些对中国民众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一份在中国的调查表明，93%的被调查者认为，日本对过去侵略的态度是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一些日本学者也认为，问题的根本在日本人对二战的认识模糊，因为虽然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人民，而且更重要的是，战争的发动者是日本，这也正是日本方面应当反省自己的地方，只有让日本人真正了解历史才能消除隔阂。^② 日本摆脱战败国地位的发展方向中包含着“某些危险倾向，例如部分领导人物对侵略历史的否认言行和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主张”等表明，“冷战后中日两国在政治安全上的分歧与不信任感增大”了。^③

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70—80年代，日本方面与中国进行交往是一种主流意见，特别是在80年代，当日本和美国由于经济磨擦矛盾加剧时，日本方面有相当多的人实际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日本协助中国繁荣，制造一个与美国经济霸权有效抗衡的力量”。在这种主流意见的影响下，日本在涉及对华政策方面，虽然有时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采取反华的政策，但在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时，一直小心翼翼。如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直没有明确地向美国承诺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时日本是否应对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甚至在90年代初，当美国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时，日本也采取了与中国保持正常关系的政策。

但1991年起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日本经济的低迷和停滞不前，破坏了日本自认为在亚洲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和与中国进行交往的实力和自信，也正是在90年代初，在日本首先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观点。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日本相当多的国民对中国的心理几乎可以归结到一点，这就是对一个走向强大的中国感到害怕”，在一些中国威胁论者看来，“即使中国没有膨胀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意图，通过国家的统一、通过追求恢复昔日帝国版图的行动，有可能形成针对周边各国的扩张主义和强权主义的威胁”。日本经济低迷和中国经济发展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日本方面认为中国发展很快而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所以主张削减日本过去对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并在经济贸易方面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使日本对从中国的进口进行限制，为此发生了在2001年4月由于日本对从中国进口的大葱、鲜蘑菇等实行限制的纠纷。^④

① 以上观点见：中江要介：《关于日中关系的一点思考》；田畑永光：《日本与中国21世纪所面临的课题》，第184—185、257—264页；何理：《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批判——评日本一些人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载《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12期。

② 挂川惠美子：《日本人怎么看中日感情》，《环球时报》2002年4月11日。

③ 见1999年10月8日《环球时报》14版王少普的文章。

④ 冯昭奎：“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9期。

1995年中国进行核试验，1996年中国为保卫国家统一反对台湾独立而进行军事演习，尤其是1997—1998年间，当东亚各国面对金融危机期望日本进行援助时，日本却感到了力不从心的无奈，而日本方面对中国在这个危机中起的积极作用，不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产生了内心的失落感，由此而产生中国是否将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的主导国的想法，对中国的怀疑加深了。正是在这种感情失落的支配下，日本对中国的不信任感逐渐占了上风。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史无前例地让它的军费第一次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在1995年通过的美日安保防卫新大纲和1996年4月发表的《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加进了所谓“日本周边有事”条款这一故意模糊的概念，以便为日后“灵活”对美国提供支援埋下了伏笔；在90年代末又出现了停止和减少日本对华贷款的呼声。由于对中国心存不信任感，因此日本的对华战略就从70—80年代的援助中国、使中国发展、使强大的中国来减轻美国对日本的压力的想法，让位于重新加强日本与美国的联盟，利用双边和多边机制来平衡或者制约中国的想法。^①

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日本对华战略发生了变化。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日本在1997年制订的《日本亚太战略：转型期的挑战》和《自民党外交政策》中，对中国的基本认识是：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但这种发展的方向不明确，所以日本一方面要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另一方面也要防范中国。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日本方面对华新战略的基本点是：继续保持日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必须与中国坦诚相待，必须毫不犹豫地推动实施更加开放的国家防御信息共享机制，而且在问题出现时，要求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更主要的是，日本要在与中国的多边接触、多边经济接触和多边合作中，防范中国并“温和地遏制中国”。《自民党外交政策》文件指出，“中国将在2010年前后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日本。中国将由一个发展中大国转变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为自己赢得可信度”。《日本亚太战略》指出，“最终，中国的未来掌握在它自己手中，其中包括怎样稳定地发展。因此，即使我们试图保持或促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也必须密切关注中国前进的方向，时刻准备应对各种各样的不测事件”。^②日本在暗中也在准备核武器，以至于日本自由党首小泽一郎在2002年4月甚至声称，日本的核电厂有足够的钚可以制造三四千枚核弹头，并能在一夜生产上千枚，日本在军事实力方面不会输给中国。^③

所谓“温和遏制”中国，就是加强美日同盟，加强日本与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关注中国发展未来进程的国家合作。日本还要求美国如果中日两国在关于钓鱼岛的争端中发生冲突时要明确支持日本，加强了美日安保条约针对中国的内容。但日本希望拉拢东南亚国家来遏制中国的企图没能获得成功。当1997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向东盟国家提出，日本与东盟之间定期进行首脑会晤以暗示日本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时，遭到了东盟国家的拒绝。东盟国家虽然对中国也有戒心，但也不希望与中国对抗，因此，东盟国家提出了召开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方首脑会议即“10+3会议”的设想并得到了成功。同时，也要看到，日本温和地遏制中国的政策，并不把中国完全设想为严重威胁，日本在台湾问题等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上也没有采取措施恶化两国关系，基本上遵守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① 迈克尔·乔纳森·格林：“应对中国——来自日本的观点”，《与中国接触》，第198—199页。

② 《与中国接触》，第209、218、220页。

③ 葛立德等：“日本右翼头脑发昏”，《环球时报》2002年4月11日。

日本对华新战略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促进日本与中国之间在多边体系中关于安全和经济的接触。日本《自民党的外交政策》指出：“对日本更为重要的是，迫使中国控制武器装备和进行裁军，呼吁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对话与合作。日本大力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鉴于中国作为一个代表该地区的主要大国，并在全球向前发展转变过程中做出贡献，日本还可能提议继俄罗斯之后，接受中国参加七国首脑会议”。^①日本起初错误地认为，中国不会参加多边会议，或者可能利用多边对话，比如中国和日本一起参加的东盟地区论坛等来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但后来他们发现，中国在提倡多边安全对话方面，甚至比日本还积极。在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1997年9月，日本比美国和欧洲国家更早与中国达成了协议。

还应当注意的是，日本国内的右翼政治家还提出了与中国对抗的主张。如石原慎太郎发表的所谓《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的文章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位日本的狂人希望煽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东抗美国，西抗中国，重温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以日本为中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甚至从历史垃圾堆中捡起早已尘封的陈词滥调，借英国人威尔兹1933年在《未来世界》一书中写的以日本为中心实现世界统一的主张来招“大和魂”，期望再次振兴日本。石原慎太郎在文章中既表现了日本人那种极没有自信的沮丧心态，认为日本是“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崩溃的震源地”，又危言耸听地制造所谓日本将会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或者被中国吞掉的谣言，另一方面，石原慎太郎激烈批判美国的弱肉强食的全球资本主义，认为不仅是伊斯兰而且也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都将“被美国全球化战略的漩涡所吞噬”，同时，他又主张日本与中国对抗，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网络，期望中国因内部的问题而四分五裂，然后把上海等地区拉进日本的中心区域中。更可悲的是，处于绝望中的日本国民竟然有许多人把这样一个狂人视为日本的救星，认为只有他才能救日本出危机。如果日本人真的把石原慎太郎捧上了首相的宝座，那不仅不是日本的出路，反而会把日本拖进一条与中国对抗的更危险的道路上，不但不会有一个什么新的日本，而且会使日本进一步沉沦，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新的亚洲了。^②

因此，发展中日关系很难，但又决不能困难而退。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日中关系对两国而言，目前都是重要而不可欠缺的”，“不管发生多少冲突，仍要构筑出一个不损害友好协助关系的基础”，“即使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经济实力不相上下时，对两国来说，对方仍是不可少的”。^③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中日双方都应理性地思考，怎样才能使中日关系摆脱目前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把中日关系在21世纪推向新的水平？

钓鱼岛问题事关国家尊严，但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十分迫切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双方可以采取克制立场，不破坏目前的现状，不采取任何行动谋求对该岛的实际占领，同时努力寻找共同开发利用的途径。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基础问题，中国方面将坚持日本应对历史问题作出深刻

^① 《与中国接触》，第214—215页。

^② 石原慎太郎：《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日本《文艺春秋》2002年3月号。

^③ 小岛朋之：《90年代的日中关系：相互认识的过程变迁》，“中国与东亚——21世纪研讨会”论文；宇野重昭：“21世纪东亚形势与日中关系”，李玉主编：《21世纪中国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311页。

反省的立场，对日本方面任何为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罪行翻案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必要的反击，但中国也可以不把这一点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个前提，在日本不出现刺激中国人民情感的言行的前提下，中国可以持耐心等待的态度；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情感问题，不应该成为影响两国重大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障碍性因素。

美日安保条约对中日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比前两个问题更为复杂些，主要涉及到美国对华政策中遏制中国的因素、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和台湾问题。但这也不足以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因素。日本追随美国参与对中国台湾事务的干涉行动，只是一种可能性，由于台湾海峡两岸近期内都不准备采取最后行动，日本方面追随美国采取主动干涉行动的现实可能性也不大。所以，中国将高度警惕美日安保条约的新动向，但也可以在美日安保条约存在的现实条件下，寻求中日关系的新的增长点。

三、中日关系的新思维：在多边合作中推动双边关系

中日关系的根本出路并不在于集中力量解决现存的三大问题，而在于控制它们，不让它们恶性发展，不让它们破坏中日关系的全局，在于寻找两国的政治经济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建构“面向 21 世纪的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①

中日关系的新思维可以概括为：1. 寻找双边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谋求双边关系的新突破；2. 在多边体系中寻找两国的共同的利益，在建立东亚的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促进双边关系的新发展；3. 中国不是与日本竞争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而是建立一种基于中日合作基础上的中日等国在其中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体系。

关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新道路，在不少论文中已有论及，因此本文重点论述多边合作问题。在多边合作中寻找双方的共同利益，在多边关系中促进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这是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前景广阔的领域。小渊首相也曾说，“中日关系不能仅仅停留在双边关系上，应致力于进一步发展面向国际社会的对话与交流”，表明了通过多边关系寻求中日关系发展新途径的想法。

区域多边合作是二战结束以来的一种新趋势，由此形成的区域一体化是与全球化同步的世界发展趋势。长期以来，区域多边合作对于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安全等问题的解决发挥着主要作用，这也是引起世人关注的地方。同时，区域多边合作在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欧盟框架内的法德双边关系就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法德两国基于地缘关系的矛盾可以追溯到近代，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更使这种矛盾空前激化，这种地缘临近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双边关系难以解决的。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法国试图通过这一进程制约德国的目的，使双边关系与区域多边合作融合在一起，从而成功的解决了法德矛盾，法德关系始终在整个多边合作框架内良性发展。因此，欧洲一体化与法德关系为通过区域多边合作解决双边关系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也同样可以作为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个思路。中日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法德关系，但在地缘关系方面又有类似之处。从客观需要来看，如果说法德轴

^① 《中日发表关于建立致力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人民日报》1998 年 11 月 27 日。

心是欧洲一体化的核心的话，那么中日轴心也应该是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核心。

东亚区域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中日两国作为该地区的两个大国，在区域多边合作框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既有共同利益，又有许多共识，这是目前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最为主要的因素。因此，区域多边合作能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直接动力。^①

中日两国在东亚区域事务领域进行合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从政治领域来看，区域多边合作是中日两国共同成为世界大国的一个必要条件。中国作为政治大国，可以有三种定位，即：社会主义大国、发展中大国、地区大国。在发挥全球影响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大国着重于意识形态因素，发展中大国则着重于经济因素，都不是中国依托的重点；中国更多的是以一个地区大国的身份发挥着影响力，亚太区域的政治合作是中国外交中的重点。中国的多极化战略是以中国、日本、欧洲、俄罗斯和美国五极为基本构架的，而中国要成为世界的一极，必须先东亚区域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样，日本要成为全球政治大国，不能仅依托西方国家阵营，也首先需要借助于东亚这个区域政治舞台，从东亚区域的政治合作中增强自身的影响力，这也正是“回归亚洲”、“脱欧入亚”等论调在日本兴起的深层原因。如果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相互对抗，相互竞争，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相互牵制，谁也成不了世界大国，只能对美国独霸世界有利。这决定了两国只能和平共处。

从经济领域来看，中日两国促进东亚多边合作，是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所有东亚国家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之下的必然反应，符合东亚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经济区域集团化客观上形成了欧洲、亚太、北美三大经济板块，有相互竞争的态势，各大国也分别以此作为依托。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区域的大国，在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情况下，都把经济的重心放在东亚区域。从贸易、投资、再到技术合作等各个方面，今后两国的经济发展与整个区域的发展都密不可分。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表明，东亚区域合作体系的建立比解决中日历史问题、领土问题更为紧迫。

从安全领域来看，东亚地区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更有利于日本。中国一向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强调平等、共同的安全观，因此一贯重视维护周边以及亚太区域的共同安全。日本对安全问题尤为重视，一直将区域安全视为外交的主要目标，主动推动区域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对日本而言，维护自身安全有三种选择：自主防卫、双边军事同盟与多边安全合作。其中，自主防卫不仅不能为本国接受，也是亚洲国家所担心的。日美军事同盟成为目前维护日本安全的主要手段，但它引起周边国家的担心和怀疑，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障碍。从长期来看，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才是日本的最佳选择，这也应成为目前日本努力的方向。所以，中国对美日安保条约的担心，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倾向的担心，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等国的防范心理，都可以借助于东亚安全的多边体系而得到化解。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中日两国的共同需要。

中日两国在区域多边合作的各个领域都有共同利益，并能达成许多共识，这些多边合作对中日两国都是互利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日两国参与到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当中，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是起很大作用的。

区域多边合作为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谈区域多边合作并不意味着超越双边关系，也不意味着回避双边关系的矛盾与问题；相反，它是以中日双边关系为基础

^① 此一部分参考了叶远强的文章《东亚合作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的，它的最终目的还在于进一步发展中日双边关系。

那么，如何认识区域多边合作对中日双边关系的意义呢？

首先，区域多边合作对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起着推动、补充的作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区域多边合作本质上是一个多边外交的场所，它增强了中日两国在各个层面的接触与对话，加强了两国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另一方面，双边关系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如政治、安全、环境、资源等，可以放到区域多边合作中加以解决，从而减少双边关系中的负面因素。

其次，区域多边合作有助于建立一种新型的地缘关系。传统的地缘双边关系强调矛盾与冲突，使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充满了战争、扩张的色彩，尤其是二战时期的德国地缘政治理论，为后来的地缘政治发展蒙上了阴影。二战结束以后，以法德双边关系为范例，区域多边合作推动了互利、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地缘关系的建立。这也印证了地缘政治中的一个理论，即地缘政治中存在着明显的边际效应，“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区域多边合作正是要建立起一种“利益倍增”的地缘关系，中日在如何确立新的地缘关系方面，正应从这一思路出发。

最后，区域多边合作增强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与相互信任，扩充了中日双边关系的内容，构筑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框架。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关键是要有相互信任的基础，这就要求两国跳出传统的双边关系框架，从亚太乃至全球安全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调整两国关系，将促进地区、全球的稳定与繁荣视为两国承担的历史责任，寻求双边关系中更多的共同点。区域多边合作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它本身已融合为中日关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就必然与中日双边关系同步发展。

中日两国具有加强区域多边合作的客观基础，同时也具有现实的区域多边合作机制。这些多边合作机制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或者还未正式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但都已经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并确立了发展方向，朝着进一步规范化、模式化的目标努力。目前，这些机制涉及到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形成正式与非正式互为补充、官方与民间互为补充、区域与次区域互为补充的多层次架构。对中日双边关系具有重要作用的主要是以下三个区域：

1. 东北亚地区。东北亚是中日两国地缘关系的中心，关乎两国的直接利益所在。东北亚区域集中了中、日、美、俄四大国，同时也包括韩国、朝鲜、蒙古等国家，矛盾错综复杂。其中，中日两国在这一区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两国关系的发展影响着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东北亚目前的多边合作发展缓慢，多边合作机制还未完全形成，但多边合作的方向越来越明确，这也决定了中日两国今后参与该地区多边合作的重点。

从经济方面来看，东北亚地区包括的人口约8亿，国民生产总值约6万多亿美元，包括中国（东北、华北、华东）、日、俄（远东地区）、韩国、朝鲜、蒙古的广大地区。本地区提出了建立渤海经济圈、黄海经济圈、日本海经济圈等多种构想，但一直未能走上正式发展轨道。目前最引人关注的是图们江地区的经济开发计划，这一计划从1992年开始启动，主要涉及到中国、俄罗斯、朝鲜三国的交界区域，日本与韩国则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参与进来，通过这一多边合作可以进一步加强东北亚各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与互利性，因此很有发展潜力。然而，受政治、安全等矛盾的制约，尤其是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这些经济多边合作一

直未能充分发展起来。现在应当进一步探讨中日韩三国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可能性。因为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联系密切，日本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日本在华投资占第一位；韩国也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对外投资对象。日本与韩国之间也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为三国进一步在东北亚的合作创造了基础。

由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日两国在东北亚的安全合作问题上进行更多的合作更为紧迫。现阶段进行的中日韩朝四方会谈，是这方面仅有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这一机制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的对立局势，为整个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体系的建立打下基础。日本虽然没有参与四方会谈，但也参与到朝鲜半岛的和平建设中，包括发展日韩关系、谋求日朝建交等方面。中日两国对朝鲜半岛的安全前景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维护该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也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两国在多边安全合作中能达成共识。

中美韩朝四国的对话机制，不应当妨碍中日和其他东北亚国家之间就建立东北亚的安全机制进行经常性的磋商。如果条件成熟，中国也应当支持俄日参加到四方会谈中来。

如果全地区的安全体制不易建立，可以先在地区内的一些国家之间建立对话机制。中俄两国之间已经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机制。俄罗斯表示将在年内与日本就北方四岛问题达成协议，这也将有助于推动日俄关系的改善。日本方面应当在推动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方面采取更多的主动和积极的措施。应当尝试在中日韩、中日俄、中日俄韩、中日韩朝之间建立安全对话机制，为日后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打下基础。1999年出现的新趋势就是在东盟“9+3”会议以外举行的中日韩三方会晤，这无疑进一步推动了中日两国在多边合作中的联系。

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目前表现出来的趋势是集中在政治、安全领域，经济领域相对滞后，这与中日双边关系目前表现出来的“经热政冷”现象正好形成对比。因此，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能补充中日双边关系中的不足，促进中日双边关系中的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多边合作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显然是有利的。

2. 东南亚地区。东南亚是中日两国利益交汇的又一个次区域。该地区的主要多边合作组织是东盟，东盟在这一地区中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多边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这一作用甚至覆盖到整个东亚地区。中日两国作为间接参与方，在本地区的多边合作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

东南亚的多边合作机制开始走上规范化的发展道路，这与东盟的成功发展是分不开的。从经济领域来看，该地区的多边合作一方面致力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相辅相成的，中日两国正是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与东盟各国展开多边经济合作。涉及到中日韩三国与东盟的多边经济合作计划，有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设想，这一设想此后发展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表现出强烈的东亚地区主义色彩，由于美国的反对以及日本态度的暧昧，这一计划发展非常缓慢，制约了多边经济合作的开展。

东南亚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热点在于政治、安全的对话与协商。成立于1993年的东盟地区论坛是本地区唯一的政治、安全多边对话机制，该论坛以东盟为中心，吸引了中、日、韩、美等许多国家，对建立互信、互利的安全秩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97年开始举行的东亚非正式首脑会议，即“9+3”会议，形成了东盟为一方，中、日、韩为另外三方的多边政治、安全对话机制，为形成区域内的政治、安全共识奠定了基础，中日两国领导人都

给予了高度重视。

中日两国参与了东南亚地区多边合作的各个方面，甚至超过了在东北亚地区参与的程度。这是因为，东南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中日两国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经济、政治利益。东南亚的多边合作，对于密切中日双边关系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它是推动中日两国增加共识的重要途径。

3. 东亚区域。中日两国最广阔的区域合作空间是整个东亚地区。

目前，能涵盖东亚区域、并涉及到中日两国双边关系的多边合作机制只有亚太经合组织。该组织是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产物，经济多边合作是它的主题。自成立以来，亚太经合组织每年召开成员国的部长级会议。从1993年起，每年又召开成员国首脑的非正式会晤，使这一组织逐步机制化，推动了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与贸易自由化。中日两国作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包含了两国巨大的经济利益。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一事件进一步显示了加强中日两国合作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亚太经合组织为中日两国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场所，推动了两国在各个层面的对话与合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直接影响着双边关系的发展。

亚太经合组织目前遇到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成员国类型复杂、成员国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它所覆盖的面过宽，这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有鉴于此，区域的多边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巨大的发展潜力，这也将是中日两国今后发展的重点。

那么，是否有必要在东北亚、东南亚两个次区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东亚多边合作体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东亚地区主要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与东盟各国，这些国家都处于东亚区域以内，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也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的共同利益，加强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国的共同要求。1988年日本政府曾提出“东亚经济圈”的想法，其实质在于促进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合作体制。但这一设想由于太日本化而没有得到东亚国家的响应。

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是与经济区域化紧密联系的，没有东亚的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东亚各国难以与一体化的欧洲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进行竞争。东亚各国必须寻找区域一体化的道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东亚非正式首脑会议等表明了东亚国家在建立东亚多边合作体系方面有更多的共识。1997年的东亚经济危机再次将这样一个问题提到了东亚各国的面前。

但在东亚的经济合作机制方面，则可能条件更成熟一些。1997年金融危机表明，亚洲已经到了考虑建立亚洲发展银行、亚洲货币体系、亚洲贸易体系、亚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时候了。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亚洲国家在面对下一次新的危机的时候，可能会付出比1997年更大的代价。除此之外，东亚各国在科技、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打击走私与犯罪、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合作也已经逐渐提上日程。

总之，中日两国在处理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时，很有必要从多边主义和东亚体系的长远目标着手，为最终建立东亚人主导的东亚政治经济秩序而发挥中日两国作为东亚两个最大国家的建设性的和主导性的作用。

四、推动中日多边合作的几个问题

探索促进中日关系的新思路，对于中日双方来说，都有一个调整心态的问题。

1. 中日两国都应当采取措施限制那些有害中日关系发展的言行。

中国方面一直很珍惜与日本的友好关系，很注意日本方面对于中国国内的一些言论的反应，充分尊重日本方面的合理意见。本来，作者在报刊上发表言论是很正常的，但日本方面曾对中国一位作者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表示不快，中国方面就马上采取相关的措施。实际上，这篇文章就本意而言，没有什么损害中日关系的内容，就整个文章来说，主旨是符合中日两国要和平友好方针的，只不过文章的标题的处理有些夸张^①。这样的问题如果和日本报刊上的反华文章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更不能与日本公开否定历史的行为相提并论。但即使如此，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还是向相关报刊提出了批评意见。从这个小事可以看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中日友好关系，对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言论是很注意限制的。当然对中国来说，对日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起的积极作用也有宣传不够的问题，比如，日本政府向中国贷款达 22600 亿日元，对中国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日本政府在打破西方国家因天安门事件而对中实行的制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等，就宣传不够，今后应多加强有关中日关系的正面宣传。

对日本方面而言，也应采取措施稳定中日关系，防止日本国内反华势力的增长，防止日本国内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的行为进一步发展。由于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因而在采取措施限制损害中日关系的言行方面的做法也会有所不同，这一点中国民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应当成为放任日本国内反华言行发展的理由，日本政府不应放弃自己的责任。对同样一种言行，同样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可以有所为，也可以有所不为。诸如根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为日本侵略中国翻案这样严重的事件，不仅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也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绝对应当给予必要的限制。这是日本方面对发展中日关系应尽的一个最起码的义务。中国人民可以等待日本方面对过去历史的反省，但不能容忍对数千万在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中死去的亡灵的侮辱。所以，只要日本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就不至让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同样，日本方面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应采取相应措施，对民间反华人士恶化中日关系的言行进行限制，不使挑衅中国人民的事件发生。

不让中日关系在现有水平发生倒退和恶化，这是以多边关系促进双边关系的一个前提。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多边关系的合作就难以进行。

对日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面对中国的成长这一事实。小泉纯一郎首相在 2002 年 5 月东京举行的《亚洲的未来》会议上，对此作出了一个积极的判断，他认为，“中国克服困难，发展开放的市场经济，将有利于亚洲各国和整个世界的繁荣”，对中国威胁论，他也表达了与日本右翼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有人开始将中国视为威胁，但重要的是先要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不必过于担心。当然，如果象前面所说的那样，小泉旋风为石原的旋风取代，日本就可能走上与中国对抗的道路。

2. 双方都应当重新审视东亚的政策，对建立东亚多边合作体系采取更积极的立场。

^① 参见《环球时报》，1999 年 10 月 8 日第 14 版。

过去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和封锁政策，在东亚先后出现的多边体系都有对中国进行包围和封锁的意图，中国对苏联提出的所谓建立亚安会模式也持高度警惕的态度。因此，中国对在东亚建立多边体系一直持较消极甚至反对的立场。80—90年代以来，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政策有很大的变化，主要在于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关系普遍有了较大的改善，中国对东亚国家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中国今后在东亚多边合作的问题上还会采取更积极更主动的立场。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如果中国不同意日本的构想，那么中国应当提出一个自己的构想”。

对日本方面来说，则需要从中日合作的角度重新思考这一问题，主要问题是日本不应当过分追随美国，不能有以美日关系为核心建筑东亚多边体系的想法，也不能试图建立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合作体系，不能把建立东亚国际秩序作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化、成为普通国家的一种政治手段，更不能把东亚多边体系用来针对中国。有些日本学者对建立东亚合作体系较悲观，认为“日本政府一直不愿意倡导一个更大胆的和平计划，因为它非常敏感亚洲邻国的反应，我自己对于上面所提及的在亚洲建立国际秩序的想法并不持乐观态度”。实际上，日本方面需要检讨的不是应不应该提出建立东亚合作体系的问题，而是日本建立东亚国际秩序的动机和做法。

例如，一些日本学者把美日安保条约看成东亚安全合作体系的基础，但实际上，美日安保条约包含了把中国作为潜在威胁的战略考虑。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1995年2月，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瑟夫·奈领导的安全事务小组起草《美国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的报告把“如何应付中国和北朝鲜的目前趋势带来的潜在威胁和不确定因素成为确保东亚地区安全的一个关键问题”来考虑，主张建立一个由多重双边军事联盟组成的体系，其中美日安保体制是核心，并涉及到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多边安全体系的问题，认为这种多边体系可以作为美日安保条约的补充。1996年4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美国总统克林顿正是从这一角度发表了美日安保体制的联合声明。^①

对亚洲各国来说，如果日本一方面倡导建立东亚安全合作体系以维护东亚的和平，另一方面却又在为过去日本对东亚各国的侵略战争翻案；一方面提出亚洲国家要团结对付北美和欧洲的挑战，另一方面又试图把东亚的安全建立在美国领导的基础上；一方面倡导东亚各国要反对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日本又把实现日本的政治大国化，把日本为中心放在很重的位置上；一方面强调中日关系很重要，另一方面却又试图通过多个双边安全体系和东亚多边体系来对付中国的潜在威胁，这怎么能让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接受日本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想法呢？中国反对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做法，当然也反对任何国家在东亚充当东亚警察的角色。

中日两国都不应单独谋求或与区外国家共同谋求东亚多边体系的主导权，而应在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同承担东亚大国的主导作用。中国方面一再表明中国不当头、中国不结盟、中国永远不作超级大国的坚强决心。对中国来说，主要问题不是要当头的问题，而是应该更积极地发挥东亚地区大国的作用的问题。

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一些日本学者提出的“在解决亚洲问题方面，日中两国必须始终发挥中心作用”的观点，但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心中，日本第一、亚洲领导非日本莫属的思想则

^① 五十岚武士：《寻求亚洲国际秩序的建立》，北京大学“中国的发展与21世纪的国际格局”讨论会论文，1998年5月。

是较为突出的。

3. 日本应当做一个真正的与亚洲国家友好合作的亚洲国家，而不应当成为亚洲国家中的西方国家。

日本长时期被亚洲国家视为西方国家，不过近来日本出现了回归亚洲的思潮，一部分人主张脱欧返亚。这一进程没有完成。有人指出，日本人心中没有亚洲国家，只有美国，只想成为军事大国^①。甚至有人说，日本近年来的诸如有意让日元贬值等所作所为是在背叛亚洲国家，亚洲国家应该放弃对日本的幻想。^②日本要在东亚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东亚的主导国家之一，就必须继续这一进程。我们注意到不少日本学者也主张多边体系方面的亚洲特色，认为“为使亚洲早日摆脱危机，必须主要依靠拥有某种相同的价值观念的亚洲国家，自行解决亚洲的问题”，指出1997年的亚洲危机预示着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因此中日两国的共同目标，“是创建一种新的社会体制，这一体制既不是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也不是国民的自由受到约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在欧美的历史中产生的，惟有如此，日中两国必须在相互尊重对方立场的同时，相互合作，探索一种既符合两国人口密度大的国情，又能让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体制”。^③另一位日本社会活动家木村一三先生也提出，日中双方能够为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应有不同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霸道理论，在主权平等、相互信任和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建立以德为本的亚洲新王道论。^④

日本成为亚洲国家是日本在建设亚洲多边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个前提。

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中国在东亚的成长不但有可能不与日本的成长相矛盾，而且有可能中国的成长将为日本的新的的发展提供动力，中国的成长将全面推动日本经济的改革。而且，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最大的市场，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世界大国，正好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甚至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经济组合模式。^⑤

（责任编辑：唐士其）

① 渡边治：《露出马脚的小泉政权——走向军事大国的野心》，《星期五周刊》2002年3月1日。

② 薛涌：《从日元贬值来看未来亚洲经济格局》，《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1月4日。

③ 藤野文昭：《21世纪的世界与日中关系》，田畑永光：《日本与中国21世纪所面临的课题》，第212、264页。

④ 木村一三：《日中间应提倡新王道论》，日本《产经新闻》2000年2月8日。

⑤ 迈克尔·谢里登：“经济停滞不前的日本把自己与飞速发展的中国拴在一起”，英国《星期日报》2002年6月16日。